



海軍年內擴編 15%

增陸戰隊加強南海部署

【香港商報訊】兩會採訪組報道：海洋形勢日漸緊張，中國也在加強海軍實力，熟悉情況的軍方權威人士向本報透露，擴編工作由去年下半年開始，會增加約15%的人手，其中陸戰隊會是重點。他又強調，軍改裁員並非一刀切，會精簡老舊裝備部隊，加強重要地區和新型力量的部署，南海會是焦點海域。

該人士直言，中國周邊熱點越來越多，維護國家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的任務非常繁重，保護國家海外利益、維護國際戰略通道安全等需求也在增加。海軍無論是人數還是設備都適應不了新形勢，擴充人手和設備是必然的事。他表示，計劃是增加約一成半的士兵，也即是現時的大約23萬會增加3萬至4萬人，其中包括再增加兩個旅的陸戰隊，今年會完成人員擴編。

裁軍與擴編不衝突

中國前年宣布裁軍30萬，但與海軍擴編並不衝突。該權威人士指出，軍隊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的改革，是為應對各戰略方向和重大安全領域的現實威脅，並不是單純的撤或降改，更不是簡單的加加減減，而是減去重複的，增加重要的力量。隨着新設備和作戰方式的改變，軍隊崗位很難清楚區分，權威人士指出，改革中將落實裁軍、完成各個軍種的調整和五大戰區的磨合，自然不會是「一刀切」，「騰籠換鳥」勢在必行，重點是壓減老舊裝備部隊，精簡機關和非戰鬥機構人員，海軍擴大也成定局，其中部分人員將從其他軍種轉隸而來，比如陸軍的部分部隊將轉隸為海軍陸戰隊，其



中國軍隊以強軍目標為引領，持續推進國防和軍隊改革。 新華社

他少數則會新徵人手。以每個旅5000至7000人計算，今次新增兩個旅的陸戰隊就佔了擴編人員的三分之一，可見其重要性，也顯示了陸海空聯合作戰的趨勢。權威人士指出，以後兵種發展方向，核心是「聯合」，打破之間的壁壘，把兵種整合到基本作戰單元裏去，使基層指揮官在作戰時能呼得來飛機，喚得來炮火，能得到衛星傳來的情報。還有就是「靈活」，能根據不同的任務進行模組化的編組，適應不同的作

戰物件、戰場環境、任務需求，發揮最大的效能。解放軍目前公開的海軍陸戰隊只有隸屬南海艦隊的第1、第164旅，兵力大約8000人，還有幾個屬於陸軍、具有兩棲作戰能力的部隊，總兵力達到了約43000人。早前網上有圖片顯示，隸屬於北部戰區陸軍第26集團軍的第77旅已經正式轉隸海軍。從「近海防禦」到「遠海防衛」相信新增的海軍力量會加強南海的部署，權威

肖捷駁軍費「不透明」論



【香港商報訊】財政部部長肖捷（上圖）昨天表示，在今年的預算報告中有關軍費、外交等數據，不存在所謂「不透明」的問題。肖捷說，今年的預算報告在起草過程中，根據近年來各方面提出的一些意見和建議，在預算報告的寫法上進行了一些小的探索。「您如果翻閱預算報告可以發現，在預算報告的後面附加了一些解釋的內容，主要是社會關切的一些熱點問題。」同時，在今年預算報告的起草中，也考慮了預算報告和預算草案的銜接問題，在預算報告中公布了全國財政收支的大帳。對於具體的支出項目，包括軍費、外交等具體支出，都已經在預算草案中反映了，就沒有在預算報告中重複羅列。肖捷說，「這當中不存在所謂『不透明』的問題，只是報告的寫法上作了一些新的探索。」據財政部有關負責人6日透露，根據預算安排，2017年中國財政撥款國防支出10443.97億元，比上年執行數增長7%。

人士直言，中國現在在釣魚島、南海幾個方向都有威脅，海軍對此未雨綢繆，提早做準備是正常的。目前海軍陸戰隊的定位更多地是在南海實施島礁作戰行動，其行政編制歸南海艦隊管轄，防守態勢明顯，比較適合「近海防禦」戰略，但若要適應中國「遠海防衛」的新戰略，就必須從體制、規模、訓練以及裝備等進行全方位改革，尤其是指揮體制的創新、海陸軍的合作等。 (ID)

黃奇帆籲降個稅最高稅率

【香港商報訊】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奇帆昨天在京表示，建議將內地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從45%降到25%，與企業所得稅稅率持平。他並指出個人所得稅改革當務之急是改革最高稅率。在當天舉行的重慶代表團全體會議上，黃奇帆說，上世紀80年代，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是55%，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45%。企業所得稅稅率幾經調整，變為現在的25%，但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仍然是45%。黃奇帆認為這種情況導致了一些問題：一是高薪階層，通過一些渠道把發工資的地方放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享受當地15%的所得稅稅率；二是部分私營企

業主稱「不拿工資」以避稅。他認為，調低個稅稅率有三個好處，首先有利於稅基擴張。2016年全國個人所得稅首次突破一萬億元人民幣，但70%的個稅由工薪階層所交，高收入群體交納比例反而很少。在周邊國家，所得稅稅收佔國家全部財政收入的15%，發達國家這一比例則達到30%。若高收入群體更多地繳納個人所得稅，中國的個稅收入在將來或可突破兩萬億元。二是有利於人才集聚，三是有利於改善國內的創新環境和投資環境。肖捷透露個稅改革框架另外，財政部部長肖捷昨天表示，目前個人所得稅

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設計和論證中，更多與家庭生計相關的開支項目會在稅前扣除。肖捷稱，這一改革方案的基本考慮是將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等部分收入項目實行按年匯總納稅，並適當增加與家庭生計相關的專項開支扣除項目。「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要予以考慮，以進一步減輕納稅人的負擔。針對今後個稅免徵額會否提高，肖捷表示，在研究制定改革方案時，將根據居民消費水平等因素進行綜合測算，確定是否提高免徵額。至於其他方面的收入項目、所得項目，如財產轉讓等，考慮繼續實行分類徵收。

扶貧也是供給側改革

特稿 昨日，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在人大記者會上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而脫貧攻堅，就是一場供給側改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2016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240萬，今年目標再減少1000萬人以上。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范小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此表示，這個目標完成起來並不容易，扶貧越往下越難。此次「扶貧攻堅戰」與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精準扶貧」之概念。而「精準」二字，與供給側改革的內涵不謀而合。事實上，扶貧供給，是一項從未停歇的政策生產，而精準扶貧的提出，正是對傳統扶貧思路的再造，提高供給質量，讓社會政策供給更契合現代社會的需求。「供給側改革」的提出，意在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改革並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在精準扶貧中，農民農產品無銷路的，為他們找到銷路；沒有產業的地方，要引進產業；因陋習而致貧的，當地政府要加強教育和引導；因病致貧的，要加強基本生活保障；此外還有教育扶貧、產業扶貧，以及杜絕因各種因素而導致的返貧等等做法，正是擴大有效供給的思路。劉永富表示，現在還沒有脫離貧困的地方，有能力離開的人都離開了，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殘。窮慣了，「富起來」這件事，他們有些人想都不敢想。如何改變送錢送物、發錢發物的方式，讓貧困人口能夠參與進來，調動他們的內生動力，發揮他們的主體作用，讓他們有參與感、有獲得感等等，這些都是供給側改革，是一篇大文章。 香港商報記者 伍敬斌

轉基因糧食商業化種植未批

【香港商報訊】兩會採訪組報道：「目前，我國沒有批准任何一種轉基因糧食作物商業化種植。」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昨天在北京的記者會上表示。他表示，中國現在首先重點發展和進行商業化種植的主要是非食用作物；而違法、違規種植是嚴格禁止的。「轉基因技術的安全性是可控的，是可以有保證的。」農業部副部長張桃林在同一場合說，世界衛生組織、歐盟委員會、國際科學理事會等眾多國際權威機構對轉基因安全性進行了長期跟蹤、評估、監測，結果都表明，經過安全評價獲得政府批准的轉基因產品與非轉基因產品是一樣安全的。據張桃林介紹，中國在轉基因的安全性管理上依法嚴格規範，建立了屬地管理為主的管理体系，強化督查。而從目前查處的非法種植的轉基因作物看，它們都是已經獲得國外安全證書和中國國家進口安全證書、並在國

外廣泛種植的，這也表明它們是安全的。但是，由於按照中國的評估規則及程序，沒有批准被種植，所以仍然是違規的，還是要對它進行禁止種植。張桃林說，中國對轉基因的發展制訂了路線圖：首先發展非食用的經濟作物，其次是飼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最後是食用作物。韓長賦（左一）昨天舉行新聞發布會。 中新社



韓長賦（左一）昨天舉行新聞發布會。 中新社

寧夏訂策助最後一批貧困者

【香港商報訊】兩會採訪組報道：在寧夏代表團昨天舉行的開訪日活動中，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李建華坦言，「就貧困人口佔比來講，寧夏是全國最高的！」當地還有近40萬貧困人口，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過去十年間，寧夏實現了百萬人口脫貧，但未來的脫貧任務將是最難啃下的骨頭。不過，他表示，寧夏會按照中央要求讓最後一批最難脫貧的群眾走上富裕道路。李建華強調，寧夏為此制定了多項政策措施來打贏脫貧攻堅戰。他說，寧夏已將所有貧困人口數據輸入

扶貧辦總目錄，因戶因人去精準施策，在中央提出的政策上，再提出實施「五個一批」，通過產業、生態、教育等舉措使得貧困人口真正擺脫貧困。教育是脫貧的關鍵。李建華指出，自治區正在推動貧苦學生資助，實施一系列職業教育工程，使山裏孩子有一技之長，可以走出大山，從此擺脫脫離貧困的「苦根」。他強調，還要通過養老保險為一批喪失勞動力的鰥寡孤獨貧困人口進行社會兜底，解決「最後一公里」的貧困問題。「今年明年，乃至2020年我們的脫貧目標一定能實現。」

兩會觀察

農民「入市」與政府「入市」

在今年總理政府工作報告關於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工作部署中，有這樣三個提法：引導農民根據市場需求發展生產、增加優質綠色農產品供給、加快推進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和品牌創建，傳遞出了一個重大信息——中國又一次糧食生產的重大變革啟動了。這一變革的核心是「引導農民根據市場需求發展生產」。昨天，農業部長韓長賦對此給出了一個解讀：「過去的農業結構調整，是在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進行的，主要是通過行政推動；這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用市場的手段，用改革的辦法，通過引導市場主體行為，促進結構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的糧食生產從解決溫飽到基本滿足自給自足的過程中，為保「糧安天下」的底線，農民，特別是糧食主產區的農民，現在，他們要真正走向市場了。那麼，對糧食主產區農戶來說，這是好事還是壞事？當然是好事。然而，好事要辦好，又不是易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調整，方向何在？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給出了方向：增加優質綠色農產品供給、加快推進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和品牌創建。可以肯定，當糧食保底收購或高價收購的補貼政策撤出後，這是中國糧農最大的出路。2016年，國家已經進行了玉米收購制度改革，實行「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新政策。但是，早已適應了種什麼靠政府的糧農能否適應總理給出的出路，仍然是一個問題。關於這種國情，行政撤出農業結構調整後，政府仍然要在糧農出路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以習近平總書記點讚的「吉林大米」為例，政府的功夫應該聚焦如下幾個方面。首先加大科技投入和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從種子、耕地、水利、種植技術等方面給予糧農生產轉型的支持。「吉林大米」的「好吃、營養、更安全」，離不開足可與日本越光米抗衡的品種培育，離不開吉林省保育良好的黑土、松花江水。其次，創新糧食品牌化戰略，加大品牌推廣力度，讓糧食品牌化後的溢價惠及糧農，激發優質農產品種植的熱情。「吉林大米」品牌建設以「品牌+大米加工產業聯盟+種植基地」的創新模式，已促進糧農增收超過10億元。再次，加快糧食生產標準、產品質量標準的制定。「吉林大米」去年完成了高於國家標準的地方標準修訂，構建了質量追溯體系等，讓糧農對優質供給的生產有據，更極大提升了消費者對國產優質農產品的信心。市場定義是簡單的，市場現實是殘酷的。糧農要「入市」，政府也必須「入市」。 香港商報記者 曲直